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农户相对贫困化分析

——基于损失承担非对称性视角

谭莹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 国际金融危机降低居民平均收入水平, 但损失分布存在城乡非对称性特征, 农民所受冲击更为强烈。以中国为例, 实证分析亚洲金融危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 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失业或回滞至农村就业, 工资收入减少; 随着负面影响蔓延至农村地区, 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速随即下降; 农民工返乡中断城镇化进程, 也使其难以分享工业化的收益。除了以上因素, 再考虑到农户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减少、人力资本毁损和社会安全网的脆弱性, 相对城镇居民, 亚洲金融危机对农民的冲击更为强烈, 成为扩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损失承担非对称性; 城乡收入差距; 亚洲金融危机; 农户相对贫困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5-0001-06

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Peasants

——from the Respect of the Un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Loss

TAN Y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average income may decrease becaus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owever, the income of farmer may decrease more seriously because of the unsymmetrical loss. We research the issue using the case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crisis cut down the increase rate of wages when the migrant workers were fired and went back to their hometown. The earning from household management is also decrease when the impact from financial crisis spread to the agriculture sector. The fluxion of home-going migrant workers breaks off the normal course of urbanization, which makes the farmer difficult to share the earning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addition,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decreas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e service, the damage and loss of human capital, the frangibility of safety ne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rapid de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compared with the urban dweller in the period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 the un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loss; the urban-rural gap of incom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relative poverty of peasants

在1973—1997年间, 发达国家发生44次金融危机, 新兴市场经济发生95次金融危机, 它们分别损失了6.25%和9.21%的GDP^[1]。非线性机制等因素使金融危机具有强传染性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 某国尤其是大国的金融危机, 无论是银行破产或货币贬值, 均能通过多种机制冲击他国, 降低居民收入水平。

金融危机是市场自发力量对经济结构扭曲的强制性调整, 是资产泡沫自发清除; 相应的经济调整使总供

给曲线下移并具有再分配效应。相对城镇居民, 国际性金融危机对一国农户的冲击更为强烈, 城乡差距问题可能因此而恶化。亚洲金融危机有可能对中国城乡差距问题已产生类似影响, 但鲜有文献涉及此问题。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对如何在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 加强对农民的保护, 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对农民的冲击,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70年代末期, 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大同平均的分配模式, 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 大部分居民摆脱经济困窘并享受丰裕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随着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 全体居民收入水平不

收稿日期: 2009-08-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6JC790016)

作者简介: 谭莹(1976-), 女, 河南郑州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断攀高,但城乡差距问题却日益突出。对此,学者们沿如下逻辑进行理论归因。

在归因城乡差距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制度与物质要素等非金融变量。林毅夫^[2]归因于“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蔡昉^[3]考察了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和城市压力集团的影响,林光彬^[4]注意到了城乡户籍歧视和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部分学者还留意到人力资本^[5]和物质资本^[6]等要素禀赋所导致的影响。上述研究视角不同,但均未考虑金融因素。针对此缺陷,一些文献将注意力转向金融发展和金融资源。

关于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问题,学界尽管有不同声音^[7],但更多研究持金融发展扩大城乡差距之观点^[8,9]。在中国,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倾斜于国有部门^[10],金融资源分配的城市化倾向拉大城乡收入差距^[11]。动态地看,金融发展与金融资源布局的城乡差异与资本空间流向变化相关。自1998年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和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国有银行大量撤并农村机构,上收基层机构信贷权利。金融调整使金融资源从农村加速流向城市^[12]。

金融资本逆流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但很少有人将它与亚洲金融危机联系起来。基于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贷款的不争事实,世界银行^[13]认为中国在90年代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并于亚洲金融危机后趋于恶化。大陆学者否认此观点,但大都承认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从多个渠道以多种机制影响到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但鲜有文献关注此问题。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产生重要影响,但几乎没有人对一重要的“历史”问题给以应有的关注。而对2008年以来因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可能相对降低农户收入、加剧乡村贫困等也无人关注。基于此,笔者拟先整理归纳国际金融危机恶化农民相对贫困的理论,然后就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相对贫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就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相对贫困的影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危机恶化农民相对贫困的机制

(一) 产品市场维度

金融危机首先通过贸易条件变化的再分配效应影响一国城乡收入分配格局。Emanuele Baldacci^[14]发现,60%以上金融危机爆发前伴随着通货膨胀;相对贸易

品而言,非贸易品价格上涨速度较低。在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大都自产自销,金融危机前价格上升速度相对较慢,金融危机开始后农民贸易条件恶化。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出现了上述现象(表1):

表1 1990—2000年中国的工农贸易条件变化

年份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	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	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
1990	97.4	104.6	107.4
1991	98.0	103.0	105.1
1992	103.4	103.1	99.7
1993	113.4	111.8	98.6
1994	139.9	117.2	83.8
1995	119.9	114.7	95.7
1996	104.2	106.2	101.9
1997	95.5	101.1	105.9
1998	92.0	97.8	106.3
1999	87.8	97.3	110.8
2000	96.4	98.8	102.5

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来。本文的贸易条件是“农产品相对价格”来表示,且为逆指标公式,即以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为基数(100)计算

“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反映每单位工业品可以购买的农产品数量,是度量工农业贸易条件的重要指标。上表显示,1991年之后,农民的贸易条件趋于改善。在1994—1995年,两次农副产品的提价政策更是进一步改善了农村的贸易条件。但是,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趋势,并使农民贸易条件大幅度恶化。1997年之后,农村贸易条件急剧恶化。1999年,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升至历史最高(110.8)。贸易条件恶化减少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表2):

表2 1994—2000年的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

年份	元/人			
	人均纯收入	家庭经营	比重/%	增长率/%
1994	1 221	881.9	72.23	29.978
1995	1 577	1 125.8	71.39	27.656
1996	1 926.1	1 362.5	70.74	21.025
1997	2 090.1	1 472.7	70.46	8.088
1998	2 162	1 466	67.81	-0.455
1999	2 210	1 448.4	65.54	-1.201
2000	2 253.4	1 427.3	63.34	-1.457

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来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主要由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组成,也包括少量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按照推理,由于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农民贸易条件的恶化将降低农民相对收入水平。表2显示,亚

洲金融危机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70%部分来自于家庭经营部分,农产品提价等政策使农村居民中的经营性收入快速增加。但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恶化贸易条件所产生的巨大负面效应使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出现绝对下降的严重后果。相应,家庭经营收入出现了长达3年的负增长。在1998—2000年间,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率分别是-0.455%, -1.201%

和-1.457%。

家庭经营收入的负增长也与出口需求减少导致的农村经济萧条相关。国际金融危机减少对他国的进口需求,他国经济受到不利影响。相对制造业和外向型经济,农业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小。但是,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部门出口减少间接降低了农产品需求,必然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表3 1996—2000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情况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变化值	-0.17	-1.40	-0.73	-1.09	-1.41	-0.67	-0.65	-0.95	0.59	-0.85

注:数据是历年农业比重的环比数据,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表3显示,在1996—2005年间,中国农业比重平均每年下降0.678个百分点。在亚洲金融危机当年,比重下降达1.40%,比平均下降速度高出两倍之多。金融危机的滞后效应非常明显:到2001年之后,农业比重下降趋势方恢复正常。亚洲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的非对称性冲击是比较突出的。

(二) 公共服务(产品)维度

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往往调整社会项目,减少对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治理等公共支出。许多农户是自我雇佣者,或是未付报酬的家政劳动者,大都没有进入社会保险计划^[15]。即使是工资劳动者,也主要就业于中小企业,雇主难以或不愿意为其购买社会保险。脆弱的社会安全网使农户受金融危机冲击尤其强烈^[16]。

不仅如此,为避免金融崩溃、减轻危机负面冲击、恢复经济增长,政府往往实施金融援助计划(如对问题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给银行存款隐性保险和免除债务人部分贷款、对银行重新注资、推进金融机构重组等)。金融援助需要大量财政成本。以墨西哥为例,2000年为解决危机的财政成本达到了20%的GDP。如考虑为阻止危机发生(1994年前)而花费的成本,财政成本更为巨大。1994年,为对问题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墨西哥中央银行损失了230亿美元外汇储备。考虑到这些,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财政成本高达1390亿美元,占2000年GDP的24%。金融危机的财政成本是巨大的。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爆发的40次银行危机中,政府支出平均占GDP的6.2%,新兴市场经济的这一比重更是高达14.7%。

金融援助由政府推动,成本由全体纳税人承担,但收益却归于部分主体。成本与收益的非对称性带来金融转移(financial transfers)。金融转移的基本方向是非参与者→参与者和债权人→债务人和非金融部门→

金融机构。Halac^[17]对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案例研究发现,金融转移的主要受益者是高收入家庭。在金融转移过程中,农户处于不利境地:他们是金融市场的低度参与者;作为整体,是金融市场的债权人;作为生产者,他们经营的是中小企业。金融转移的再分配效应恶化农户经济处境,受益者是银行股东、银行的债务人和银行本身。农民在收入再分配的底层部分,金融转移使其处境更为艰难。

拉丁美洲情形也存在于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加大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力度,为之提供巨额援助。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其出资,并剥离14000亿元不良贷款。为推进改制上市,政府先后为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分别注入450亿和150亿美元外汇储备。如加上对债务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贷款豁免,中国为化解金融危机付出巨额财政成本。财政成本支付者是全体纳税人,受益者主要是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农民利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三) 要素市场维度

1. 劳动力市场

按劳动力储藏假说,如雇主认为危机是暂时性的话,非熟练工人首先被解雇。农民技能较低且主要就业于非正规部门,就业机会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收入水平下降更厉害^[14]。随着危机蔓延,正规部门工人进入非正规部门,城镇居民减少家政服务需求;替代效应恶化农户就业形势。表4显示了亚洲危机对我国农民就业的影响。

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劳动力相对报酬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相应,农村劳动力单向流入城市部门就业。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就业人员增长率较低,是正常现象。农村就业人员增长率也应该有其规律,

但亚洲危机似乎打破了这一规律。1998年,农村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并首次出现负增长;比城镇就业人员增

表4 1994—2000年乡村就业情况 万人

年份	城镇就业人员	农村就业人员	就业人员增长率/%	
			农村	城镇
1994	18 653	48 802	0.53	2.14
1995	19 040	49 025	0.46	2.07
1996	19 922	49 028	0.01	4.63
1997	20 781	49 039	0.02	4.31
1998	21 616	49 021	-0.04	4.02
1999	22 412	48 982	-0.08	3.68
2000	23 151	48 934	-0.098	3.29

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来

速下降幅度要小得多。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正如劳动力储藏假说认为的那样,当我国宏观经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企业经营困难时,首先被解雇的是农民工。其二,国家在治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时,公共资源较多的被配置于城市部门,加上城市失业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对完善,城市居民因亚洲金融危机而产生的失业问题相对较轻。表4的信息显示,中国的情况表明,亚洲金融危机给农民就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相对城镇居民,农民工失业形势尤其严峻。这一现象,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得到证明,即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及其之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增速快速下降(表5)。

表5 1994—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增速 %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增长率	5.48	35.22	34.49	27.45	14.15	11.47	9.89

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来

表5信息与表4之间有内在联系,失业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加变得困难起来。1996年前,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速较快。1997年之后,增长率直线下降。

2. 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尽管存在分歧,但大多数人认为,金融发展增加农民金融机会(Chigumira, 2003),有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Jalilian, 2001; Beck and Kunt, 2004)。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小银行纷纷破产;大银行缩减信贷规模,尤其是紧缩小额贷款业务。金融发展倒退减少农户及其主要雇佣者即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制约农民消费平滑能力,恶化农民收入状况。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大量撤并在农村地区基层机构。1998年前,国有银行市县分支机构有较大贷款权限,

可视为一个个中小银行。国有银行机构撤并类似于大量中小银行破产。与此同时,大量位于农村地区的机构如分理处、储蓄所、营业部也被纷纷撤销,这减少了农民的信贷可获得性。

3. 人力资本

金融危机降低农户当前生活水平,也影响脱贫能力。在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农户陷入绝对贫困状态,健康受损,婴儿死亡率上升。农村妇女和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儿童辍学率相应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下降。这些因素对农户人力资本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15],降低了农户脱贫的能力。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文教支出可以反映出农民人力资本投资。表7显示,1997年之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文教支出增长率急剧下降。出现这种情形的可能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因收入大幅度减少,农户减少文化教育支出。文教支出减少降低了农村地区高等教育升学率和中等教育普及率,从长期内影响了农民人力资本的增加,降低了其脱贫的能力。

表6 1994—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文教支出增长率 %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增长率	28.59	36.35	29.39	11.85	7.56	5.58	10.93

资料来源: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来

4. 社会资本

除个人和家庭外,社会也受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苦难(收入减少等)以及由此引起的种族、宗教冲突和移民问题,严重破坏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进而引起社会动荡或暴乱(Ferreira et al, 1999)。1997年的印度尼西亚、1998年的俄罗斯,便是例证。社会资本的毁损使农户雪上加霜。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社会治安形势呈恶化趋势,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急剧上升,相对1996年,2000年结伙斗殴、寻衅滋事案件上升了56.9%和偷窃财务案件上升了18.1%。可以推测,上述案件中,无业游民可能是主要肇事者,广大农民则是社会资本恶化的主要受害者。

三、金融危机引致农民相对贫困的实证分析

(一) 金融危机与贫富差距

国际金融危机通过产品市场、公共服务与要素市场等渠道给农民带来非对称性冲击,农民收入相对降低较多。如考虑到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的差距,问题会更为严重。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但并不完全

与物价挂钩。金融危机前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Emanuele Baldacci考察了1969—1988年间发展中国家的65次金融危机,其中62%的危机在发生前一年就存在通货膨胀^[14],减少农民实际工资。相对资本利得,在危机期间,劳动所得比重相对下降。农户收入以现金为主,通货膨胀使其缴纳相对较多的持币税。类似现象存在于资产价格。危机期间,股价暴跌大幅度减少城市居民资产性收入,但他们有房租等资产性收入,其实际工资下降幅度亦小于农户。农户收入以现金为主,调整资产组合的能力有限。相对有资产收入和较高调整资产组合能力的城市居民,资产相对价格(或收益)变化的财富效应对农户伤害更深^[18]。

上述各种机制的综合影响产生一个普通现象,即金融危机减少农民相对收入并恶化乡村贫困问题。研究发现,拉丁美洲20次危机都伴随着贫困人口的增长和贫困比率的上升;其中15次伴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14]。那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期间与危机之后,贫困比率大都有所上升,贫困问题有所恶化。在贫困化面前,并不是所有人受到的打击都是一样的。有人受益(如国外投资者),有人受损相对较轻(如银行股东),有人受损相对严重(如农民)。

(二) 金融危机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情况又是怎样呢?下表给出了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城乡差距演变趋势:

表8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78-2007)

	%											
年份	1978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差距	38.9	53.8	47.1	46.2	46.1	43.8	45.4	41.7	38.7	35.8	34.9	36.8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差距	39.8	40.5	39.9	37.8	35.9	34.5	32.1	30.9	31.2	31.0	30.5	30.0

注: 1) 城乡收入差距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2) 相关数据为名义变量。3) 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来

表8显示,中国城乡差距于1997年之后快速扩大。根据上述理论分析,这种现象可能与亚洲金融危机相关。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笔者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GAP = \beta_1 C + \beta_2 D + \sum_i \beta_i X_i + \varepsilon$$

β 是系数,c为是常数项, ε 为误差项,因变量GAP为城乡收入差距,D是国际金融危机的虚拟变量。核心自变量包括农村就业人员增长率(Job)、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Ine)、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增长率(Inw)、农村居民家庭文教支出增长率(Exe)、农业贷款增长率(Dka)、乡镇企业贷款增长率(Dkx)、政策性补贴增长率(Exb)、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Exs)。控制变量包括城乡就业结构(Lab,第一产业就业/全国从业人员)、城镇化(Urb,城镇人口比重)和工业化(Ind,工业增加值/GDP)。D1,D2和D3分别是1997,1998,1999的虚拟变量。中国于1993之后开始实质性推进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本文样本数据时间范围以该年为起点,终点年份是2007年。上述各数据均为名义变量,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2007年的政策性补贴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由1993—2006年的年均增长率趋势估计而来。由于是时间序列数据,回归模型没有考虑常数项。采取OLS方法,按照t值检验和显著性水平的筛选原则,逐步回归如下

三个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表9 实证分析的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NE			-0.12(-9.91)*
INW	-0.64(-8.71)*	-0.51(-13.07)*	-0.55(-31.46)*
JOB	1.98(3.37)**	1.49(1.94)***	2.61(12.83)*
Dka	-0.02(-1.96)**	-0.03(-1.97)***	-0.05(-11.86)*
Dkx	-0.07(-4.16)**	-0.04(-4.51)*	-0.01(-2.11)**
Exe	0.23(5.03)*	0.13(4.27)*	0.17(17.87)*
Exb	-0.04(-3.91)**	-0.02(-2.63)**	-1.26(-12.91)*
Exs	-0.01(-1.94)**	-0.02(-1.98)***	0.41(6.41)**
Urb	-1.94(-9.11)*	-1.57(-14.8)*	-2.70(-27.15)*
Lab	1.79(5.27)*	1.11(5.19)*	2.21(22.67)*
Ind	0.59(2.48)***	1.06(5.10)*	0.79(13.26)*
D1	3.53(2.47)***		
D2		-0.01(-1.90)	
D3			-2.41(-10.87)*
R ²	0.998 3	0.994 5	0.998 8

*,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1%, 5%和 10%

表9表明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城乡差距的具体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相对紧密的现代部门首先受到冲击,然后波及传统部门。亚洲金融危机证明这一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时,现代部门(如出口和制造业)和城市地区首当其冲受其影响。随着危机蔓延,负面影响以加速之势波及农村地区,城乡差距因如下机制而扩大。金融危机减少出口,就业于这些部门的农民工大量失业,或回滞农村地区就业。在现代部门就业时,农民工边际劳动力较高。当农民工回到工资可以灵活调整的农村地区就业时,工资性收入的重要性下降了。城市居民的工资则由于粘性而难以下降。于是,如回归结果表明的那样,亚洲金融危机带来大量农民失业,减少其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回滞带来负产品。农民因失业而回到原籍从事家庭经营业。农业比较收益较低,随着危机蔓延,农业部门进入萧条状态,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受到不利影响。农民工回到原籍之后,城镇化正常进程被打断,农民被排斥在现代部门之外,乡村贫困因而加剧。公共服务市场的情况类似。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经济调整政策,通过重组、注资等方法救助国有金融机构。如拉丁美洲一样,中国的经济调整政策具有显著的再分配效应:农村是受害者而城市是受益者^[19]。金融市场情形大致相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银行大量撤并基层机构,农村地区尤其是乡镇企业信贷可获得性大幅度减低,恶化农民相对贫困问题。最后是人力资本渠道。文教支出可以缩小城乡差距,但农民缺乏平滑消费的金融能力。当农民因金融危机而收入减少时,他们减少教育投资,脱贫能力随之降低。

四、结论与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金融危机降低经济伙伴的平均收入水平。相对城市居民,它对农民的影响更为严重。产品市场上,在危机前的通货膨胀过程中,农产品价格上涨相对较慢。危机发生后,首先被冲击的是现代部门,但随后农业部门遭遇更猛烈的冲击。作为边际劳动力,农民首先因被解雇而失业。如退出现代部门而就业于传统部门,较低的边际生产率减少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农民相对经济地位也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毁损而下降。农民返乡中断了正常的城镇化进程,使它们难以分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收益。城市倾向的经济调整政策和社会安全网进一步降低农民相对经济地位。所有这一切的综合作用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降低农民相对收入水平,恶化乡村贫困问题。

本研究表明,相对城镇居民,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的冲击更为猛烈,农民相对收入下降,农村相

对贫困恶化。而且,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在大部分领域,在金融危机之后的1~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农民仍然要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大概在2001年之后,亚洲金融危机对农民相对贫困的负面才基本消除。

亚洲金融危机给农民带来的非对称性损失。对此问题,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总结,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引起重视。令人遗憾的是,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2007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金融海啸,并波及实体部门。已经纳入全球体系的中国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冲击。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外向型经济所受影响尤其深刻,但危机随即波及到传统部门。当前,国际金融正在蔓延,负面冲击正从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波及内陆地区,从现代部门蔓延至传统部门。与拉丁美洲不同,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扩大内需的双松财政与货币政策。但是,如本文分析的那样,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村地区的冲击,存在1~3年的滞后期,它对农民的伤害也更为严重。社会各界对国际金融危机给农民带来的非对称性损失、对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产生的影响缺乏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对和谐社会的建设等问题,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理论工作者,也缺乏应有的重视。

基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要尽可能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乡村相对贫困、进而对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农民保护措施。这措施包括:完善农产品的价格保护政策,尽可能使农民获得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尤其在社会失业保障领域,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利益,将之纳入到社会安全网之中。在教育、科技、环境治理、公共卫生等领域,要基本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基本均等。在制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时,固然要防止金融崩溃,但也要减少金融转移对农民的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考虑,在制定经济调整政策时,政府可以制定一些特别的农民保护政策(如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向农村地区倾向,公共投资的就业岗位向农民工倾向等等)。

在经济调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给农民以适当保护,尽可能屏蔽或减弱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下转第11页)